

##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于1993年1月4日—7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于1990年8月在香港举行)。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联合举办的。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共90人,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澳门,美国和日本。与会者有:刘大年、白介夫、金冲及、龚书铎、李侃、高存信、魏宏运、王桧林,杜学魁、谭汝谦(香港),吴天威、薛君度、熊玠、朱永德(美国),井上清、山口一郎、笠原十九司、伊原泽周、西村成雄(日本)等。台湾学者蒋永敬、李恩涵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会议共收到论文70篇。

刘大年在开幕词中指出:近百年中日关系一系列大事,不仅直接影响“中日两国间的历史演变”,而且“还影响到近代国际关系的局势,造成远东国际关系一个又一个热点”。“对近百年的中日关系,我们检讨得越是彻底,认识得越是深刻,就越是能够知道两国今天应该怎样相处,如何更好地推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吴天威、杜学魁也指出,只有把历史上中日关系的是非弄清,中日两国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与会者就近百年中日关系广泛的课题进行了研讨,现将会上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介绍如后。

### 一. 近代中日经济文化关系

许多学者的论文探讨了近代中日两国间经济文化关系问题,而又多集中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两国经济关系方面。

傅佛果(美)论述了1864年日本箱馆(函馆)奉行派其下属山

口举直乘健须丸航行到中国上海窥探中国情况的经过。过去中日关系史论著对此鲜有提及。周启乾考察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对中国市场的调查情况：自明治初期起一些日本人纷纷来华探访中国市场，出版了一些调研成果，为日本打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19世纪90年代，日本农商务省鼓吹把注意力转向这个“亚洲之新舞台”，日本驻华使领人员更直接搜集中国市场情报，为扩大对华贸易出谋献策。郭蕴静论述说：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把天津作为它向中国发动“商战”的重要目标。20世纪初日本输入天津的贸易额远远超过英美法三国，把天津作为它倾销产品和掠夺财富的基地。任达（美）考察了20世纪初叶，清政府引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教育法律体制情况。王晓秋论述到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在日本政府和多数报刊舆论进行攻击的情况下，日本进步人士如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却对中国友人声援，批判日本侵华政策。

宓汝成分析，日本在“九一八”、“七七”两个事件前夕，都发起对华铁路交涉，是为其武力侵略作掩护的，中国政府中央与地方之间两次尚能协调一致对付，挫折了它的阴谋。魏宏运探讨了30—40年代日本鸦片侵华政策，指出：1917年英国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后，日本成了鸦片侵华的主要角色。日本在其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制造和经销毒品，诱惑吸毒，鸦片侵华成为日本国策，鸦片成为日军侵华工具。解学诗论述说：满铁在华北的分支兴中公司及继后的华北开发会社，是日本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总枢纽。在华北铁路煤矿等产业部门，满铁拥有举足轻重的侵略地位。对满铁转向华北经济侵略，解认为是因为满铁在满洲的政治任务已告完成，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满铁在中国东北被“满重”（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排挤的缘故。朱玉湘认为，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农业破坏和掠夺，分三个阶段，1938年成立“兴亚院”之前进行野蛮性的破坏，以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发”掠夺资源，其后则实行“中日满农业一体化”方针，使关内占领区农业变为日本经济的附庸。曾业英分析，日本占领华北后建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

行,实质上是日本国家银行的分行,其金融掠夺方式为独占货币发行权,实行通货膨胀,统制汇兑,榨取民间资本。

## 二. 中日甲午战争

一些学者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戚其章论述了日本为发动甲午战争对英、俄两国采取的外交策略:因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对俄采取“暂时稳住”的方针,在三次关键时刻都以谎言掩饰侵略意图;利用英国惧俄心理,以防俄作说词,动摇英国企图调停中日冲突的决心,把英国拉向自己一边。

张富强分析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双方各自的外交谈判策略,因这是力量相差悬殊的羊与狼的谈判,李无法与伊、陆颀颀。杨惠萍认为,马关中日议和时,李鸿章抱定“争回一分是一分”的宗旨,为少割地少赔款是尽了力的,不能把清廷应负的责任都加于李鸿章一人。有的学者则强调说李奉行屈辱外交路线,是卖国的。

谢俊美根据清廷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所遗未刊资料,揭示日本早就把勒索赔款作为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和谈中提出赔款需付息等苛刻条件,借赎辽又多勒索,支付赔款又以“库平需实足色”,“划定公平之镑价”等借口,损害中国,加上驻军费开支,甲午战争后中国实际支付赔款二亿九千万两。为支付对日赔款,中国被迫向西方举借七亿两巨额外债,损失利权无算。

关捷论述了1894年11月21—25日,日军侵占旅顺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大屠杀,被杀害的中国人有两万余,世界舆论谴责日军,称之为“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野兽”。

## 三.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尚明轩指出:孙中山曾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活动,他与日本

各个阶层的众多人士有交往。日本政府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与日本民间人士不同,日本历届内阁援助过清政府、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压制革新运动为事”,“从未支持过孙中山”。孙与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和梅屋庄吉的高尚情谊,值得珍视。

山口一郎(日)分析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论,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观,与他的明治维新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孙中山高度评价明治维新,认为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但早在同盟会时期,孙已对日本的“侵略主义”有了警戒心,后来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指出:日本政府和武人忘记了“维新志士之怀抱”,侵略中国,堕落为“西方霸道的鹰犬”。有的学者对于孙中山是否向日本承诺过它可以取得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问题,倾向肯定看法,俞辛焯认为: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要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作为政治家对某一问题的言论,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会有不同说法,应从国际关系和外交礼仪方面辨别其真意。

#### 四. 中日外交和日本侵华谋略活动

有关中日外交和日本侵华谋略活动的课题学者们论及较多。

夏良才分析了1911—1914年间日英对华政策分歧点:中国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想保持清摄政王载沣的地位,维护清室君主统治,英国则支持袁世凯控制清政权,迫使载沣退位;对中国政体,日本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虽亦主君宪制,但随形势的发展,主张悉听中国人自定;日本加紧向英国势力范围的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进行经济渗透,遭到英国的抵制。

对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历次中日外交谈判学者们研讨较多。伊原泽周(日)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反蒋运动与日本“币原外交”活动情况,其中述及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与币原会谈的内容:陈要求日本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售与武器,币原要求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

杨天石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黄郛档案等资料,探讨了黄郛与日方进行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会谈关内外通车通邮过程中,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指出: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妥协方针已确立为国策,但委曲未能求全,日本侵略者气焰愈盛,黄郛辞北平政整会之职,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走入死谷。

谢国兴论述“何梅协定”时认为:何梅之间虽无法律形式完备的协议书,但实质上确有一时的协定。其功过需从安内攘外之结构性环境加以理解。“安内”包括“剿共”、“统一”、“生产建设”等层面,欲厚植国力,以达最后“攘外”之目的,故其对日政策之妥协退让,其动机不能以“卖国”单纯视之。何梅协定实为安内攘外政策达于极致之结果,中国因形格势禁,被迫允诺无理要挟,无论何应钦或中央负责当局,实无荣辱可言。齐福霖论述说,“广田三原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系列对华扩张和侵略的政策总汇,国民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出发,对它采取了不拒绝也不接受的方针,以争取时间,备战抗日。

蒋永敬论述了张群自1935年12月12日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负责执行对日政策,先后与日本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举行调整中日外交关系的谈判的情况,认为:张群为调整中日关系而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值得肯定,是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对日政策由消极应付而至积极进取的一大转变。

这次会上,一些学者对日本侵华谋略活动作了探讨。沈予论述了从1937年8月“船津工作”、1938年“宇垣一孔祥熙交涉”,到1945年铃木内阁使者央司徒雷登赴渝斡旋止,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玩弄“和平交涉”伎俩的情况,指出:“和平交涉”是日本为了实现其征服和灭亡中国总战略,同军事手段交替使用相互配合的策略,根源于其狂妄的扩张野心与小国综合国力严重不足这样内在的矛盾。重庆政府蒋介石对“和平交涉”的态度,几次出现谋求妥协的政治动摇,但也有对日周旋和运用策略的因素存在。藤井志津枝(日)专门对日本的“桐工作”——对“宋子良”的诱和作了剖析,

认为：中日双方对“桐工作”各怀阴谋，中国派遣蓝衣社特务王新衡冒充“宋子良”，对日展开侦谋战，日本为发动南方战争，非结束中日战争不可，愿降低条件，谋求“和谈”成功。“桐工作”显示中日双方在情报、国力、战力上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玩“和平牌”比日军高明。曾景忠、毛磊等论述到日本分裂中国的谋略活动，分化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

还有些学者论及中国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关系。水野明(日)论述了张学良下令东北易帜起，为维护国家主权旗帜鲜明地抵抗日本侵略，当政时颁布了多达 200 号法令、训令和布告的情况。西村成雄(日)分析了张学良政权币制改革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系，认为：张学良采取发展资本主义政策，抵制日本势力的渗透，他实行币制改革以辽宁现大洋票取代奉天票为东北统一货币，是在通货领域贯彻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要提前阻止中国实现通货统一的局面。马振犇论及华北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的对日态度。

## 五．第二次中日战争

与会学者对第二次中日战争中的问题研讨最多。这大致可以分为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两个方面。

论及日本侵华方面的有：

1、日本天皇、财阀与侵华战争，及日本国内政治。井上清(日)从日本宪法有关天皇的条款和明治、大政、昭和天皇的实际作为，论证了从 1874 年日本军侵占台湾至 1945 年日本投降止，在日本对中国进行的一切侵略战争中天皇所起的作用。他批驳了“天皇不亲政”，天皇实质上不是战争的发动和统帅者的论调，指出：近代日本所进行的一切战争，不管是大的战争，还是小的战争，都是天皇统帅的战争，都是天皇的战争。现行日本宪法继续维护天皇是“神裔”的观念，而由这种神的权威所实现的国民统合，正是现代日本

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张振鹜对《昭和天皇独白录》作了剖析,指出:天皇对日本侵华所作的自我揭示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又回避了许多侵华问题。不过,这有限的自白也证明,他对日本侵华负有责任。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以征服、独霸中国为终极目标,祖孙三代一脉相承,而以昭和一朝全面对华进攻而登峰造极。在昭和天皇心目中,中国不是一个与日本对等的国家,而是供日本侵略的对象。《独白录》对日本长期侵略中国没有丝毫悔意、歉意和反省。朱永德(美)论述了日本财阀集团产生发展的过程,指出财阀受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是日帝剥削榨取他国的工具,财团与日帝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自甲午以来,日本靠剥削中国发展自己,使中国无力自我建设,在重温日本财阀兴盛过程时,不得不问日本今后应怎样补偿中国近世因日本侵略而受到的损害。

何理认为,对外侵略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原动力。近代日本经历了从军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对日本国政局演变和法西斯体制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2、日本侵华事件。郎维成分析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最高统治集团授意支持下,以驻天津日军为主,仿效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而谋划发动华北事变,前后策动三次天津事件,妄图制造华北伪政权。他不同意将其视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枝节。但一些学者认为,驻津日军策动的只能算骚乱,不能称事变。

3、侵华日军的罪行暴行。不少学者分别论述了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中国各地的罪行暴行。唐培吉分“一二八”、“八一三”、上海沦陷后三个阶段论述了日本侵沪暴行种种;蔡德金、耿光连论述侵华日军在湘暴行,揭露了日军在湘阴华容的“慰安所”的情况,要求日本对受害者赔偿。梁师华、吴忠才论述了日本侵略军两次蹂躏广西情况及广西军民抗日活动,顾大全论述日本侵华期间在滇西和贵州犯下的罪行。孙宅巍论述南京城陷和日军大屠杀过程中,南京军民的反抗斗争,认为承认这种抗争,不影响对日本侵略者罪行声

讨。温贤美论述了日机对重庆和四川内地的轰炸及四川人民的损失情况。

笠原十九司(日)提出,在战争中,战场的背后苦难大半集中在柔弱的女性身上,自九一八事变起,日中战争中中国女性遭受日本兵蹂躏很悲惨,应改变日本人对日本兵凌辱中国女性这一历史事实回避的态度。

4、“三光政策”。李恩涵和姬田光义(日)对日军“扫荡”敌后根据地时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作了探究。李恩涵根据中、英、日文资料对日军在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暴行,作了研究,指出:“三光作战”(或“烬灭作战”)是对抗日地区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目的是彻底摧毁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和物质基础。此战术的始作俑者为多田骏,扩大“三光”暴行使达于高峰者为冈村宁次。他提出,日本“三光”战术造成抗日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的破坏损失,日本现在的政府仍应向中国民众赔偿。姬田光义探讨“三光”一词是对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向部下训示“三戒”(不杀、不犯、不烧)所作讽刺谴责的造语。他认为,现在韩国提出“慰安妇”问题,中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受害索赔”要求的法案,均是日本从战后直到现在没有认识和承担战争责任所招致的结果。

5、细菌战和掠夺劳工。韩晓、金成民论证,日军七三一部队(石井部队),是日本参谋本部根据裕仁天皇敕令于1933年在哈尔滨密设的细菌武器研究所,它设置监狱,以活人作试验,12年内残杀中苏蒙朝等国3000多人,为掩盖罪行在战败时竭力销毁罪证。刘宝辰论述道,被掳到日本秋田县的中国劳工不堪虐待,于1945年6月30日暴动,被日本军警镇压,是为“花冈事件”。河北大学师生对此事件和日本强掳劳工作了调查,认为日本应对受害者赔偿。

论及中国抗日方面的有:

1、知识分子和民众抗日救亡活动。李侃回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历史道路,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亡



斗争的特点:(1)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性、野蛮性和残暴性,激发了全民抗日救亡的自觉性和广泛的群众性;(2)全民族命运和利益的共同性,决定了抗日救亡目标的一致性;(3)由不自觉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柯博文(美)论述说:卢沟桥事变后,救国会领导人把注意力转向动员民众支持抗战,动员民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救国会重视群众运动与不信任群众运动的蒋介石发生了直接冲突。范忠程论述了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期间湖南省抗日救亡活动情况。张注洪论述说:七七事变后中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

2、国民党抗日与正面战场。王维礼评析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不是抗日战略,而是妥协战略,当然不否定蒋介石具有民族主义立场。张瑞德剖析了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的出身背景和素质变化:高级军官,出身黄埔者增加,出身保定者减少,出身地方军校和行伍者无大变化,由于受军事教育质量不足,升迁过速等原因,其学问能力不如日军;中下级军官出身军校的比例下降,出身行伍者增加,素质有下降趋势;士兵知识水准低,但驯良守纪律,惯于吃苦。由于生活水准降低,营养不良,流动性大,无法充分训练,战力受到影响。王天成对“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历史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唐华元以第一次长沙会战为例分析说,正面战场诸役除有胜有负外,也有双方势均力敌,处于暂时的平局,胜、负、平局的交替变化,显示了抗日战场的艰难曲折历程。

3、共产党抗日与敌后游击战争。白竟凡与高存信论述到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冀中根据地军民采取地道战战术,坚持抗日斗争,拔除敌之据点,说地道是人民群众用血肉筑起的地下长城。杨奎松论析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几经演变:八路军抗战初经历集中作战和分散发展两个阶段;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形势变化,又从分散游击转变为保持相对集中的兵力和随时进行运动战的机动;百团大战结束,1941年后,从注重军事斗争转为突出政治斗争,从注重集中化正规化转为强调化整

为零地方化,从积极扩充军队数量和根据地面积,转为巩固内部精兵简政,保存大规模集中和正规化的任务。1944年12月中共才明确从退却转入反攻,重新提出部队要大规模集中和正规化。

此外,有的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提出了看法。王桧林认为:(1)从世界大战必须是多国间的战争等标准看,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2)国民党坚持持久战以等待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之解决而解决的“自然机运”的政略基本上实现了;(3)共产党的战略策略随战争发展、共产国际战略方针和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前后有很大变化,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才认真采取联合英、美政府及其附属国上层人士的政策,这是中共进入世界政治体系的真正开端;(4)蒋介石主张“先亚后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表明,“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是成功的。

## 六. 战后与当前的中日关系

一部分与会学者对战后及当前中日关系的课题作了探讨。

吴天威(美)就二次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情况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东京审判的成就远不如纽伦堡审判,因“头号战犯”裕仁未受审判失色失真;人类历史上罪大恶极的“七三一”细菌战部队自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以下全体人员无一人被起诉,实为东京审判一极大污点;受国际政治影响,纽伦堡审判达到预期的目的,东京审判几乎半途而废,遗患无穷。

谭汝谦(香港)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次修改作了详细的深入的研究分析:1945—1950盟国占领时期,所有日本教科书被指示要清除和摆脱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当时许多人无保留地承认日本对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日本恢复主权后,许多教科书开始转嫁战争责任,责难中、美、英和其他国家要为这场悲剧

负责。从1980年开始,随着自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压倒多数,它发起篡改教科书的有力运动。强迫篡改教科书来自文部省。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重性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宋绍英分析日本的东亚经济谋略:战前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典型模式,战后则谋求加强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并逐步实现东亚经济集团化。但推行这一谋略还有矛盾制约因素,包括历史纠纷的伤痕犹存,近些年来日本出现的“新国家主义”、“大日本主义”思潮,对外经济关系宣扬以大国支配为内涵的“国际贡献论”,这些加重了东亚各国人民对日戒心。在中日经济关系中,日本要在技术上对中国保持“等距离领先15年”和在东亚经济集团化构想中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令人想起战前日本推行的扩张主义的东亚经济战略的影子。

熊玠(美)从行为科学国际政治理论角度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和当前中日关系。他用“权势均衡”理论解释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英美为什么与中国并肩抗日,以及战争结束的安排。他认为,目前世界进入“地缘经济”时代,在国际贸易金融关系上美国(与西欧)已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亦不例外。抗战(太平洋战争)的军事打斗阶段虽在1945年终止,但现在以经济方式延长,当年中英美列强共同抵制日本军事称霸,按“权势均衡”原则,预料全世界有一天被日本“通吃”的国家会联合起来抗拒日本经济称霸,赢得经济战场上的“抗战”。薛君度(美)、余振(澳门)也对当前中日关系及国际局势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有的学者对用“权势均衡”理论解释历史现象提出疑问,比如:英美帮助中国抗战是由于“均势”规则,还是因为英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未来国际间的打斗能否完全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

(本刊讯)